

冯天瑜 ● 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收录集刊

2014 年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收录集刊

2014年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论丛. 2014 年. 第 2 辑/冯天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61-5858-6

I. ①人… II. ①冯… III. ①社会科学—2014—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9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 斌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1.5
插 页 2
字 数 565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 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池田知久
刘纲纪 朱 雷 谷川道雄 李学勤
杜维明 庞 朴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谢和耐 裘锡圭

编 委 会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礼堂 李维武 陈文新
陈庆辉 陈 伟 陈 锋 吴根友
沈壮海 张建民 杨 华 杨逢彬
罗国祥 尚永亮 郭齐勇

主 编 冯天瑜

副 主 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杨 华

本期执行主编 陈文新

本期执行编辑 余来明

目 录

甲午双甲子纪念

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冯天瑜 (3)
甲午双甲子的反省	张亚中 (9)
迟到的觉醒:甲午战败一百二十周年祭	
——兼及马关签约前后的李鸿章	何晓明 (13)
回顾甲午:从分裂时代的中国意识谈中华民族发展.....	黄丽生 (28)
日本掠台图谋的历史考察	聂长顺 汪小义 (32)

人文探寻

史学是求真的事业	
——周锡瑞教授访问记	左松涛 (49)
20 世纪思想家对“中国路径”的探讨	杨 华 (58)
刘永济与“学衡”的离合及其文化姿态	江俊伟 陈文新 (80)

哲学与思想

论张载哲学思想中的“感通”问题	刘乐恒 (113)
-----------------------	-------------

王船山“乾坤并建”思想的当代哲学蕴涵

- 与熊十力、牟宗三相比较…………… 王林伟 (126)
- “气象”概念的理学化过程研究…………… 彭 婷 (151)
- 黄龙派禅师的寺院管理思想…………… 孙劲松 (166)

经济社会与文化

南宋地方官的鬼神观与地方实践

- 以朱熹为中心的考察…………… 陈 曦 田 浩 (183)
- 从能臣王竑致仕看明中叶用人得失…………… 王雪华 (202)
- 明代永乐年间庶吉士的文化教育及著述活动…………… 李 华 (212)
- 明清徽州地区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研究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张 绪 (240)
- 清代鄂西南山区宗族的发展与地方社会建构…………… 陈新立 (256)
- 清代驻防八旗军与太平天国…………… 潘洪钢 (269)

礼制研究

- 社会取象于大自然:礼制及孝道的神明观…………… 郭静云 (301)
- 上博简《内礼》发覆…………… 贾海生 (322)
- 论三年丧内之祭诸家礼说…………… 刁小龙 (343)

文学与文体

- 六朝笔记小说之恋爱形态研究…………… 杨春艳 (349)
- 宫体诗人与山水诗…………… 卢海涛 (361)
- 《玉台新咏》与《诗品》编撰之比较…………… 熊红菊 刘运好 (369)

论唐玄宗对乐舞艺术的管理及其社会意义	龚 贤 (378)
民间想象与织女的身份叠加	肖 波 (388)

文史考证

《左传精舍志》辨难发微	葛刚岩 (405)
历史的故事化与故事的历史化	
——介子推故事流变中的文体因素与文化因素	彭 娟 (414)

近代文化与国学

试述晚清北洋政治文化的生成	姜海龙 (429)
近代新学家的华严思想探析	
——以康有为、章太炎为视角的考察	姚彬彬 (442)
西学东渐背景下作为国学的“文学”	
——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中心的考察	余来明 赵亚萍 (456)
抗战前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选址征地考论	刘文祥 (464)
对“是西非中”文化观的系统反思	
——读《正本清源论中西：对某种中国文化观的病理学剖析》	
.....	刘依平 (486)

甲午双甲子纪念

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冯天瑜*

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和“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进程。因变革深广度的差异，历30年，至19世纪末叶，中日国力悬殊（弱方的清朝并不自知）。1894年7月，蓄谋已久的日本挑起战端，清朝消极应战，日军在朝鲜、辽东重创清朝陆师，在黄海完败北洋舰队。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生”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字”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

* 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

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的狂想。“八纮”一词原出自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字（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地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字”，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四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字”之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字”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字”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字”。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字”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见《旧唐书·刘仁轨传》）。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

400 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 1964 年版）

1591 年（天正十九年）、1597 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 460 余年间，凡 30 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覬觐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 1633—1857 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紘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后，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

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本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似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效仿。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来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

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地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欺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木摩书房平成九年版，第30页）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福泽谕吉（1835—1901）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欺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和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38—240页）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

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 7 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 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紘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甲午双甲子的反省

张亚中^{*}

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数百年来，扶桑吸取了中原文化的养分，大和民族却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特质。

大清在鸦片战争的战败让日本对华夏文明失望了，它发现原有的文化母体是如此的不堪，促使它决定要再找一个新的精神奶妈，福泽谕吉开始高声呼吁日本必须要“脱亚入欧”，才能找到新生命。从此，日本人的和服外多加了一套燕尾服，他们的手上不仅有武士刀，更多了洋枪大炮。日本不仅不再追随他们眼中的“支那”，而是想彻底的决裂。大恩必用仇报，如此才能异化大恩的原有本质，肯定新宠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弑除原有的旧爱。

伊底帕斯的弑父情结在 1895 年出现。虚弱的大清本来想透过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来强身，但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等不及要试试自己的肌肉，也掩藏不了自己内心的贪婪。终于在甲午海战中，不仅是弑清，也是弑亲。它不仅打断了大清现代化的进程，更用割地来羞辱它昔日器物与精神文明的导师。

挫败后的中国，即使含泪割让了台澎，但是对于日本并没有仇恨，反而是反躬自省，更不犹豫地勇敢向昔日的学生学习。但是这个历史上初尝霸权滋味的日本却是用高傲的态度面对中国，日本不仅向西方的知识与制度学习，也学习到了西方的帝国主义霸道与傲慢。大和民族从此不再“以和为贵”，而是“以和为名”。它决定要继续对中国蚕食鲸吞。

民国成立，中国却很快地陷入军阀内斗。日本对北洋政府的不平等二十一条，激发了五四运动，触动中国思想波澜壮阔的争辩。北伐统一，中国进入难得的黄金十年建设期。日本忍不住了，它无法接受中国的再次振兴，它决定不仅要再次阻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要置中国于死地，这既是伊底帕斯弑父情结的最终展现，也是要满足帝国主义最原始的征服欲望。

^{*}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

日本战略从对中国的“分而治之”，转为“速战速决”。

八年的浴血抗战，日本战败了。但是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并不认为它败于中国，而是败于美国。它们认为，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让它们无条件投降，而不是被落后的中国人打败。

更不幸的是，胜利后的中国，还来不及喘息就陷入了内战。1949年后，两岸在国际间进行的是主权之争。兄弟阅墙，外人得利，两岸的分裂使得日本变成获益者。一个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的现象出现了，战后的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缺少了战胜国的参与。战败国强占了战胜国的领土，钓鱼岛就是例子。战败国不但没有损失任何领土，反而巩固了它以往所夺取的土地，琉球就是例子。战败国不但没有真诚反省的忏悔，反而去膜拜世人所认定的战犯，靖国神社就是例子。手持武士道的日本人笑了，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需要认错吗？

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它的幽灵并没有在台湾消失。日本虽然离开了台湾，但是它与台湾千丝万缕的关系却难以切断。日本殖民台湾 50 年，自然留下一批皇民化的子民。在他们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与愤怒后，开始支持“台独”，日本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故乡。在意识形态对抗的两极体系下，台湾与日本共同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台北退出了联合国以后，北京与东京立刻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两岸敌对情况下，日本也是大陆要拉拢的对象。靠着日本经济的实力，两岸兄弟的阅墙，日本可以轻松地游走在两岸。

大和民族有它的可取的勤奋，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逐渐又取得了它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地位。但是日本没有想到，它最重要的盟邦美国开始对它下手。1985 年的大国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优势受到阻碍，从此陷入衰退期。

相对的，两个让日本忧虑的因素出现了。一个是从 1979 年开始推动“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经济上开始加足马力往前冲。不论是“大国崛起”“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的口号，都让日本开始恐惧，日本开始在国际间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个是两岸关系的改善。从 1987 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视开始，两岸的互动日益频繁。

中国大陆的崛起，与两岸关系的改善，让日本感受到压力。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两岸虽然没有合作，但是在这些领土属于整个中国主权这个大是大非的认识上仍有基本的默契。不过，由于两岸政治定位还没有达到共识，两岸之间的互信无法建立，即使两岸从 2008 年经济与人员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密切，两岸的认同却越来越远。两岸认同上的歧义，让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不断被侵蚀，甚而受到威胁。